

# 从华夏边缘到潮流之中 ——汉魏六朝会稽地域文化的历史转型<sup>①</sup>

杨 颖 李相银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汉魏六朝是会稽地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东汉时期,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儒风浸润,推动会稽地域文化向主流儒风靠拢,六朝时政治中心的变迁和江南经济的跃升进一步助力偏居江南一隅的会稽具备了区域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会稽地域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文化世家的作用至关重要。本土士族的发展和侨居士族的交融使得会稽文化世家的发展丰富立体,既提供了坚守的定力和发展的基础,又提供了审视的新视角和创新的动力。在与中央保持一定距离的文化环境中,会稽地域文化的主体性得到关注和彰显,进而在学术、文化、艺术诸多方面产生具有引领性的成果,将地域文化的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 会稽;汉魏六朝;地域文化;转型

作为江南名郡,会稽的地域文化形象最早可以上溯到大禹时代,《史记·夏本纪》记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司马迁,1982:89)。因为这场公元前2200多年“爵有德,封有功”(袁康,2013:221)的重要会议,会稽山载诸史册。无余受封越地,开启了东南之国的历史,勾践十年生聚,铸就了春秋末期霸主的辉煌。从范蠡营造越国新都开始,会稽一地的行政区划意义开始鲜明起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原吴越之地设会稽郡,郡治设在吴县(今苏州),都尉治所设在山阴(今绍兴)。东汉永建四年(129)实行“吴会分治”,大体以今钱塘江为界,江南为会稽郡,辖十四县,郡治在山阴。六朝期间,会稽郡建制基本

① 本文系绍兴市文化工程重大项目“浙东唐诗之路研究”(课题编号:21WHZD01)子课题“六朝会稽文化世家与浙东唐诗之路”(课题编号:21WHZD01-6Z)、江苏省社科项目“大运河江苏段行记资料整理与研究(隋一元)”(课题编号:22ZWB00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行记文学中的大运河行旅与运河书写研究(隋一元)”(课题编号:2022SJYB1928)的阶段性成果。

延续,治所也一直在山阴。隋代改会稽郡为越州,南宋升越州为绍兴府,元代称绍兴路,明清恢复绍兴府,其间辖县与治所基本不变。

综合而言,从东汉后期到六朝,会稽郡的名称和建制是基本稳定的。隋代之后,名称虽变,但辖区和治所的稳定性仍然延续多朝。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不仅加强了会稽地域文化圈的稳定性,也为我们观察会稽地域文化的流变提供了绝佳的背景。在会稽地域文化从华夏边缘走向区域中心,甚至以其创新发展引领时代潮流的过程中,汉魏六朝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伴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和江南经济的跃升,长期偏居江南之南的会稽乘势而上,频繁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并以其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和“名士多居之”的世家群体优势,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迎来了地域文化的一次深刻转型。

## 1. 华夏边缘:早期会稽地域文化形象

对于会稽而言,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形象来自大禹。大禹是一个有着多重内涵的文化符号,他既是可追溯至黄帝的圣贤人物,又是救百姓于滔天洪水的治水英雄,更是建立夏朝的开国君王,在中华文化史中,是上古先贤的代表性人物。

会稽与大禹之间的联系在《吴越春秋》中有详细的记载。《越王无余外传》记载了大禹与会稽的渊源:第一次是得治水之法;第二次是会盟诸侯;第三次则是葬于会稽之山。虽然山中得道或会盟地点不易考证,但大禹陵寝的文化意义却在拜祭制度中延续并不断加强,成为会稽的核心文化标识。从夏王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赵晔,2008:193),到汉高祖以无余子孙摇为越王,以奉越后的传承,再到秦始皇等历代帝王及使者祭拜大禹的传统,都可见大禹在会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大禹之后第二个融入会稽文化形象的重要人物是越王勾践。《史记》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司马迁,1982:1739)勾践作为上古先贤大禹之苗裔,是会稽地区沉寂多年后出现的闪耀中原的国君。勾践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他继承乃父遗志,励精图治、灭吴雪耻,终成春秋霸主的功绩,更深入浅人的,是他卧薪尝胆的坚强意志,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不屈斗志。这种意志和斗志传承千年,融入会稽人的骨血,也成就了会稽人的骄傲。明朝末年,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身亡后,留都南京的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很快清兵攻破南京,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山阴王思任写《让马瑶草》一文,对马士英逃往浙江的举动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职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王思任,2018)虽然会稽因为地理位置边缘成为逃难之地,但王思任对马士英的逃跑表达的强烈不屑仍然传递着会稽人对地域历史品格的坚守。200多年后,另一位会稽人鲁迅援引王思任之

语,表示“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鲁迅,2021),足见勾践胆剑精神的正向影响力。

大禹和勾践奠定了会稽早期地域文化的核心标签,但是客观而言,这2位人物兼有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印记,其超绝的存在感也是早期会稽文化缺乏其他强有力文化元素所导致的。事实上,在漫长的先秦时期,远离中原的会稽地区在很多时候还保留着化外之地的形象,越地先民长期过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赵晔,2008:193)的生活,“断发文身”是诸多先秦文献对越人原始风貌的固定印象。直至《史记·货殖列传》中,楚越的地域形象仍然是原始和落后的: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晷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司马迁,1982:3270)

关于越地民风与中原的巨大差异,《越绝书》中的一则记载很值得玩味:

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周九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勾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袁康,2013:222)

这是称霸后的勾践和孔子的对话。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但被拒绝的理由和方式各不相同。虽然孔子的礼乐主张在当时的确难以实现,但大部分国家的君主都曾表现出对其理想化主张的欣赏,比如同样地处南方的楚国昭王,曾起意给孔子及其弟子七百里封地,后被令尹子西阻止。唯有这一则文献中的越王勾践,虽然也有“躬求贤圣”的姿态,但直截了当地表示孔子的那一套不适合越地民风民性。“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是越人与环境协调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形成了“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气质秉性。“性脆而愚”或是其不足,“锐兵任死”却实在是越国图谋霸业的重要条件。在勾践看来,越地民风有着根深蒂固的地域印记,是无法与中原礼乐文明的发展路径相融合的。

## 2. 儒风浸润:东汉会稽地域文化的主流化转向

会稽地域文化的转型是从社会思想的转向开始的。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汉代围绕儒学展开了全面的文化建设。东汉在“兴文”“尊儒”上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汉书·儒林传》曰:“自光武中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经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范晔,1965:2588)其中展现的儒学风气,和班固《东都赋》中描述的“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范晔,1965:1368)状况相印证,东汉社会“崇儒”风气的广泛深入,可以想见。

有经学入仕制度的保证加上东汉诸帝对儒学的大力倡导,东汉的经学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背景。从中央政治经济到法律政策,从礼仪制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史官的撰述评价机制,无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翻开《后汉书》,从一般列传到后面的《儒林》《文苑》甚至《隐逸》《独行》诸类传记,传主们普遍有求学、通经或教授的经历。以治经获致声名,以明经入仕,以授经为生,甚至为官者亦教学。这样一个与经学息息相关的士人阶层的存在,必然孕育出相应的社会势力,经学士族由此产生。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会稽的文化转型,受到内外两重动力的影响。

外部动力是循吏教化与儒学文化浸润。东汉儒学的全面渗透是社会大背景,在此基础之上,会稽儒学的传播与几位任职会稽的循吏关系密切。东汉年间,曾经任职会稽太守的第五伦、张霸、刘宠,包括曾经拜任会稽都尉的任延,都是东汉知名的循吏。治学善教、举贤劝孝、移风易俗是这几人共同的标签。他们在会稽废淫祀、止盗贼、兴儒风、举贤才的作为,既成就了循吏官声的功绩,也给会稽民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后汉书》记载张霸任会稽太守时,“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范晔,1965:1241),正是循吏治理效果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王莽治乱,许多士人避乱江东,也给会稽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先进文化的刺激,出现了“会稽颇称多士”(范晔,1965:2460—2461)的情况。

内部是会稽精英群体内生发展动力。王永平在考察了会稽、吴郡两地具有代表性的世家大族之后指出,在汉廷以经术取士的政策导向下,地方士族在文化积累的基础上获得政治上的优势。“东汉中晚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士族的初步形成及其活动,才促成了江东地域社会风貌的改观。”(王永平,2003:12)会稽的虞氏、贺氏等经学世家,也正是在东汉后期逐步成形并开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三国志》中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陈寿,1959:1321)

在会稽士族中,虞翻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虞翻的易学成就,能够代表两汉易学的第一流水准,但在中原名士孔融的肯定中,仍然带有几分意外的惊喜。可见,东汉时会稽文化已经开始有存在感,但整体印象仍需进一步提升。

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之下,会稽的儒学,在东汉迅速发展,形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吴从祥在对东汉吴越名士进行全面梳理后得出结论:“东汉时期,会稽的儒学发展颇胜于吴郡,儒师名士数量远胜于吴郡。”(吴从祥,2019)

儒风的内外浸润,推动了经学士族的产生和发展,这对会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东汉,经学士族是州郡政治的主体,并以地方为基础向上发展。唐长孺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就大族名士在州郡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相当多的论述。唐长孺指出:“东汉末年,大姓、名士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广泛地控制农村,文化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唐长孺,1992:47)对一般的地方士族来说,以郡吏入仕始终是一条相对稳定和便捷的道路。在会稽这一相对边缘的行政区域,儒学的深度渗透推进了地方社会对帝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州郡察举入仕作为重要的上升路径又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士族发展经学文化的内生动力。

### 3. 多元发展:六朝庄园经济的兴盛与文化世家的崛起

东汉的儒风浸润,为会稽文化的主流转向奠定了基础,但会稽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整体提升,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陈寿,1982:1214)“诛其英豪”虽仅四字,但其后对地方不合作的豪强的血腥杀戮和强力镇压可以想见。孙策入会稽郡,得到了董袭、全柔等会稽本土士族的拥护,其后对于山阴贺氏、余姚虞氏等世家大族,也有所笼络,比如曾察贺齐孝廉,拜永宁长,命虞翻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孙权时期,吴范、阚泽等会稽士人,也陆续进入江东政坛。但相比于陆、朱、张、顾等吴郡士族的煊赫,会稽士族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都不足称道。孙吴治江东八十余年,史籍所见,会稽士族居于高位者仅有丁固(左御史大夫、司徒)、钟离牧(平魏将军、扬武将军、武陵太守)、贺邵(吴郡太守、中书令)等寥寥数人。西晋定都洛阳,政治架构以北方为中心,连入洛的江东豪门陆氏兄弟都不免受辱,会稽士族的边缘化地位自不待言。东晋南渡,北方士族人数多,实力强,

更是牢牢把握着统治地位。周一良在《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中,对担任东晋南朝中央、地方主要官职的南北人物进行了统计分析,从数字来看,侨人占据绝对优势,而南方士人,在东晋时期只在尚书仆射、侍中等个别官职上能接近侨人的三分之一,在尚书令、吏部尚书等官职上,不到侨人的五分之一,在中书监令等官职上,则是空白。到了南朝,这种不平衡的情况愈发严重。“宋尚书令十五人、仆射三十一人、中书监令二十四人,无一南人。齐尚书令十一人中亦无南人,仆射十六人中南得一,中书监令二十二人中南得一。皆北人占绝对优势”(周一良,1997)。不仅如此,南人有限的机会基本集中在吴郡张氏和吴兴沈氏,会稽本土世家在上述统计中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机会。

政治上的失落并不意味着会稽的落寞。六朝时期,恰是世家大族的迅速发展,撑起了会稽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东汉年间的“会稽颇称多士”(范晔,1965:2460—2461)是相对于会稽地方文化从薄弱到初显气候而言。到了东晋,随着晋室南渡,大量北方士族南下会稽定居,“名士多居之”(房玄龄,1974:2098—2099)无疑是会稽集聚世家名族的实况。

东晋的会稽士族版图,因为晋室南渡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会稽的本土士族延续着东吴时期的边缘化状态,在政坛上影响力甚弱,转而在加强自身家族经济、文化实力方面着力,形成了一些实力雄厚的地方家族势力。《宋书·孔符灵传》载:“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沈约,1974:1533)正是因为有雄厚的家族势力,会稽士族在地方事务上,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话语权,西晋末年,石冰叛乱,贺循合众应之,成功平叛,并迎还故会稽相,展示了地方世家大族的实力。虽然士族豪强势力也会遭遇打压,如东晋末期“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刘裕)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沈约,1974:27),不仅直接处死了虞亮,而且严厉处置了对此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员司马休之。但到了梁朝,虞氏所在,仍有“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姚思廉,1973:768)的情况。

另一方面,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大族,为避开地方士族势力更强大的吴郡,进一步向南进入会稽,在自带光环的同时,也与地方士族交融,形成了发展地主庄园经济的高潮。王、谢等豪族在会稽的庄园田产之庞大、物产之丰富,在史籍文献和各类文学记录中时常可见。

家族庄园经济的兴盛对会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是非常突出的。早在司马迁之时,就已经评价过楚越之地的自然条件“果隋羸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司马迁,1982:3270),丰饶的自然禀赋,是会稽发展的基础条件。过往的地广人稀,限制了发展的动力,而此时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士族发展的需求,无疑激发着会稽的潜力,带动着地方经济水平的飞速提升。《三国志·吴志》中就曾提到会稽永兴土地之富饶,《宋书》中更是记载南朝宋时山阴县“民户三万,海内剧邑”

(沈约,1974;2079),可见会稽郡在六朝的迅速发展。富庶优越的经济生活既为世家大族提供了悠游隐逸之所和探幽涉险之资,也为家族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千百年间的“未通上国”到建制之后相对封闭的内部发展,六朝会稽士族的发展,从一开始面临的就比较多元的局面。与中原大族的关系,与江东吴郡等名族的关系,或涉及思想风尚,或涉及空间竞争,都是会稽本土士族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晋室南渡以后,大量侨姓望族选择了会稽地区,这些南迁士族携北方文化的风尚进入会稽,不仅为会稽的世家结构注入了新鲜血液,也进行着融入和改变,起到了丰富和立体的作用,使得会稽世家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居会稽并从东汉开始在文化上有所表现的名门望族,有山阴贺氏、山阴钟离氏、山阴谢氏、山阴赵氏、山阴陈氏、上虞綦毋氏;孙吴时期,余姚虞氏、山阴丁氏、山阴阚氏也逐渐崭露头角;东晋南朝,上虞魏氏等也迅速发展。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房玄龄,1974;1746)。很多北方士族通过分封、任职或私人关系,来到了会稽地区,形成了侨居的士族群体。侨居士族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世家有太原王氏、陈郡谢氏、北地傅氏、高阳许氏、鄱陵庾氏、陈留阮氏、太原孙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济阳江氏、谯国戴氏等。南北士族的集聚和发展,为会稽地域文化的繁荣和新变奠定了基石。

#### 4. 东南重镇:政治疏离与文化引领

在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地域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力一向是巨大的。六朝是地域和家族相结合,形成多个区域文化中心的特殊历史阶段,对会稽而言,更是南北交汇,在延续越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地域环境影响下的世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会稽士族传承与创新的走向。

会稽从地理位置而言,位于长江中下游,境内会稽山脉绵延,钱塘江、曹娥江等水系密布,东方又有蜿蜒的海岸线和天然港口。长久以来,对于中央政权而言,钱塘江以东是东南沿海“海贼”出没和诸越活跃的偏远之地。六朝以来,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南方经济的发展,备海制越的重心由浙西外推到浙东,楼劲在《六朝浙东与钱唐升州》一文中指出:“六朝浙东渐在一系列挑战和机遇中摘掉了偏远叵测之地的帽子,并在保持备海制越底色的同时更增其要,成为江东政权的战略重镇和迁都备选之地。”(楼劲,2021)

东汉的儒学浸染推动了会稽文化的主流化转型,但会稽在王朝的文化版图中仍然相当边缘。以南方政权为特点的六朝给会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世家大族的立体化发展与突出的区域特色相结合,成就了会稽区域文化中心的地位,会稽地域文化也在六朝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政治上而言,会稽离中心舞台仍然有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虽由地域空间而来,却也呈现在文化和心态之上。

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对玄学风尚的保守态度。《晋书·儒林传序》:“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房玄龄,1974:2346)虽然善于谈玄的人物和家族在仕途和影响力上拥有明显的优势,但以虞预为代表的会稽士族不仅没有随波逐流,而且表达了对玄风蔓延的强烈批评——“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房玄龄,1974:2147)。虞预的态度常被视为地方士族因循守旧不能跟上风潮的体现,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虞预的批评指出了玄风兴盛的弊端,有其合理性。事实上,以山阴贺氏、余姚虞氏、山阴孔氏为代表的会稽世家,治“礼”、研“易”、谈“五经”、论“天体”,传承延续着汉代的经学传统,在多元思想中的坚守体现了儒学的传承之力,也为南朝后期乃至隋唐以后社会思想回归儒学主流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

除了会稽本土士族对玄学的态度之外,与政治中心的疏离可以说是定居会稽士族的普遍表现,侨居士族的代表谢安屡次拒绝朝廷征召,隐居东山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谢灵运在《与庐陵王义真笺》中也说道:“会稽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沈约,1974:2282)从当时门阀士族的普遍经历来看,的确也是为政者多居于建康,而会稽一地则多是或主动求隐或被动失意者的选择。骄傲地疏离中央政治,是会稽与都城的地理空间——士人与庙堂之间的心理空间的融合呈现。基于在政治上较为边缘和退让的共性,会稽士族在发展上也大都重视庄园经济。西晋的占田制度,刘宋的占山法令,也都为会稽地区庄园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重要保障。无论是世居会稽的孔、魏、虞、谢等族“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葛洪,1991:145),还是陈郡谢氏、陈留阮氏、太原王氏等侨居大族遍布会稽山水的园林田舍,奢华闲适是会稽士族生活的普遍标签。

相较于早期以大禹、越国文化为突出表征的会稽文化形象,六朝会稽地域文化在东汉的儒学转向之后,进一步展示了融入和对话主流文化的能力。伴随着区域战略、经济地位的提升,文化世族的集聚和发展,会稽地区对革新潮流表现出的坚守、面向政治中心呈现出的距离感,都体现了更强的地域文化自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会稽地域文化以士族群体为代表,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有影响力甚至引领力的成果。经学方面,余姚虞氏五世习《易》,虞翻著《周易注》,成为三国时期最有名的易学家;山阴贺氏以礼学名家,在“宗庙始建,旧仪多阙”的东晋,贺循官拜太常,直接参与了朝廷的制度建设,“朝廷疑滞皆咨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房玄龄,1974:1830)。在史学方面,虞预撰《晋书》《会稽典录》《诸虞传》,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将其与陈寿、陆机、沈约等相提并

论,称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刘知己,1993);谢承撰《后汉书》《会稽先贤传》,在私家撰述中风采斐然;慧皎撰写《高僧传》,开创了为僧人作传的先河,成为六朝宗教史籍的代表性成果。文学方面,本土士族有以孔稚珪为代表的山阴孔氏,《北山移文》被评为“句必净,字必巧,真可谓精绝之甚。此唐文所祖”(孙鏞,2017:252);侨居士族中更有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等挟深厚的文学基底来到会稽,精研诗歌创作,孙绰“以玄对山水”开拓了玄言诗的文学领域,出生于会稽的谢灵运更是引领了山泽之游的文学群体,将六朝会稽文学带上了新的高度。艺术方面,依托会稽山和剡山一带的佛教中心,佛教造像艺术得到极大发展,新昌大佛及千佛岩成为东晋南朝宗教艺术的典范之作;会稽上虞、始宁两地作为越窑的核心产区,将越地青瓷推向了新的高度,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有纪年款铭的古瓷青瓷虎子和已知六朝最早的堆塑罐都出于会稽;在六朝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的书法艺术,更是以会稽为根据地,以皇象、王羲之、王献之等顶峰人物引领,全面推动草、行、楷等新书体的盛行,成就了书史的辉煌。

除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成果,会稽地域文化在审美风尚方面更展现出独特的引领性。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阐述:“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1981:183)在这个发现山水之美的时代,会稽无疑是一个核心区域。王羲之《兰亭集序》开篇便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2022)这场著名的士族聚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会稽山水在文学史上的标志性贡献——山水诗歌和散文。无论是谢灵运、谢惠连的山水诗系列创作,还是孙绰《太平山铭》、王籍《入若耶溪》之类的单篇名作,抑或是郦道元《水经注》中对若耶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的精彩描摹,都留下了会稽山水的深刻印记。在具有时代典范意义的《世说新语》中,涉及观览的条目有近20条,地点基本上都集中在江东,会稽又是其中的重心。《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会稽郡记》云:“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嵒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澄壑镜彻,清流泻注。”(刘义庆,2007:82)

是怎样的山水能够如此激发文人对自然的关照?南朝宋山阴人孔晔的《会稽记》曾经有过详细的记录。虽然此书在隋代已经散佚,但从后世文献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会稽山水带给六朝人的风华。仅仅是山,保留在《艺文类聚》山部、《初学记》地理部、《太平御览》地部等各类文献中《会稽记》的文字,就涉及赤城山、秦望山、嵎山、太平山、宛委山、射的山、鸟带山、龙头山、四明山、坛燕山、白石山、玺山、罗山、陈音山、铜牛山、赤城山、亭山、洛思山等大小山峰二十余座,内容遍及山中悬泉飞瀑等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典故。这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山水自然作为独立景观的密集呈现,在以《会稽记》为代表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慨叹当年众峰之杰的秦望山的悬磴孤危、峭路险绝,可以冥想四明山的高峰轶云、连岫蔽日,似乎也能想见白

楼亭的临流映壑,感受若耶溪的和风畅达……有丘壑,有清流,有登高观海处,有云雾听松地。远离政治斗争的压力,有富足的经济支撑,放松的士族徜徉于庄园内外、山水之间,从文学的视角展开了对自然之美的体验与挖掘。

在这样的山水之中,魏晋士人对山水之美的用心体会和表达更加让人印象深刻。顾恺之从会稽还都,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刘义庆,2007:170)顾恺之语中的山水,有山岩、河川、草木、云霞,更有高低之势、争流之态、葱茏之感、明灭之意,寥寥数语,确乎点出了山水审美的精髓。宗白华盛赞此语:“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宗白华,1981:179)

下面的例子更能体现山水审美深层次的价值: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到处亦不近。”(刘义庆,2007:567)

这座白石山,在孔晔《会稽记》中曾经出现过,是文人墨客常去赏玩宴游之所。值得玩味的是此条中的人物品评。孙绰寓居会稽,以赏玩山水为乐,亦长于诗文,于山水之趣,颇有发言权,他的这句评价,将卫永的“神情都不关山水”和“作文”建立起了逻辑关系。孙绰的不屑体现了山水审美与人物品鉴的关联,虽然庾公在回应中也肯定卫永自有令人倾到处,但承认卫风韵不及诸人本身,也是对山水审美与士人风韵关系的认可。因为对景的敏感和与景相遇时的用心,在魏晋时期,景观不仅是观览的对象,也进入了士人的话语体系。以会稽为代表的江南山水,在被挖掘审美价值的过程中,也成为文化和心态的象征,具有更深入人心的意义。

## 5. 结语

会稽地域文化在汉魏六朝的历史转型,显在的变化是从华夏边缘迈向区域中心,逐步具备潮流引领力,而更深层次的转变则是地域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夯实、拓展、渐趋深厚。会稽本土士族在经学方面焕发的光彩,多少是在西晋末年中原“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房玄龄,1974:2346)的整体式微背景下,因为地理位置的偏居一隅而担负起的传承使命。六朝会稽的史学成果中,地理、方志类著作蔚为大观,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孔晔《会稽记》、贺循《会稽记》、钟离岫《会稽先贤传》、朱育《会稽土地记》、虞愿《会稽记》以及谢灵运《游名山志》《永嘉记》等,标志着地域文化认知进入自觉阶段。会稽文学艺术的繁荣更是以名士大

族的聚集为基础的,王、谢大族的聚集活动,竺潜和支遁等佛教领袖的潜居,都在事实上建构了会稽文学艺术发展的环境,也将会稽的地理自然融入各类作品,对会稽山水自然的观照,更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突围。

会稽地域文化在汉魏六朝的转型,恰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言“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南方之宏扩斯文”(钱穆,1996)的代表。这一跨越式发展既得益于东汉以来会稽融入主流儒风的努力,也来自会稽战略地位的提升、经济实力的增强,更离不开作为核心力量的土族群体在多元文化融合的环境中对区域地理环境、文化特色自觉的审视和发扬。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维联动造就了会稽地域文化的新貌,也为新时代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陈寿,1959.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
- 房玄龄,1974.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 葛洪,1991. 抱朴子外篇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
- 楼劲,2021. 六朝浙东与钱唐升州[M]//包伟民.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千年以来东南地区文化区位重构与杭州的崛起. 杭州:杭州出版社,5.
- 鲁迅,2021. 朝花夕拾[M]//鲁迅散文集. 武汉:长江出版社,345.
- 刘知几,1993. 史通[M]//史通·文史通义. 长沙:岳麓书社,107.
- 刘义庆,2007. 世说新语笺疏[M]. 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 北京:中华书局.
- 钱穆,1996.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约,1974.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孙鑛,2017. 文选集评[M]//程怡. 汉魏六朝诗文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52.
- 司马迁,1982.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 唐长孺,1992. 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M]//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47.
- 王永平,2003. 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王思任,2018. 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M]. 李鸣,注评.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45.
- 王羲之,2022. 兰亭集序[M]//吴楚材,吴调侯. 古文观止.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338.
- 姚思廉,1973. 梁书:卷五十三·沈瑀传[M]. 北京:中华书局.
- 袁康,2013. 越绝书校释[M]. 李步嘉,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
- 周一良,1997.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M]//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57-58.
- 赵晔,2008. 吴越春秋全译[M]. 张觉,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宗白华,1981.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From the Periphery of China to the Mainstream: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Kuaiji During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YANG Ying LI Xiangyin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were important perio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Kuaiji.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infiltration of Confucianism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facilitated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Kuaiji to align with mainstream Confucian values. By the Six Dynasties, the shifts of political centers and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Jiangnan region further elevated Kuaiji—once a remote corner of the south—into a regional hub with radiating power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Kuaiji, the role of cultural families was of vital importance. The growth of local gentry and their integration with migrant elite clans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Kuaiji's cultural families rich and multi-faceted, providing both the stability for persistence and a foundation for progress, as well as fresh perspectives for examination and the motivation for innovation. Within a cultural environment maintaining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y,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Kuaiji gained recognition and prominence, and thus produced leading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academia, culture, and the arts, elevating the spirit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to new heights.

**Keywords:** Kuaiji;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regional culture;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

杨颖,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地方典籍与文化研究。

李相银,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和地方文化研究。